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日本學

第八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K313.03

B393

:8

日 本 学

第八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0369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 第八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ISBN 7-301-03538-1

I. 日… II. 北…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2092/19

书 名:日本学(第八辑)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责任编辑:杜若明

标准书号:ISBN 7-301-03538-1/G·42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350千字

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5.50元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正确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仁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耄耋犹笔耕 东瀛载誉归	(1)
松村谦三与中日关系	刘德有(3)
吉田茂与阿登纳外交战略及其异同的比较	王 蕾(21)
50 年代日本赔偿外交评析	郑学伟(48)
德川幕府初期的对外关系与锁国	沈仁安(62)
试论近代日本对夏威夷的移民	陈文寿(79)
清末留日学生心态初探	李凤斌(103)
中国的南方补给线与日本的南进战略	徐 勇(125)
幕末天皇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天皇 [日]依田熹家著 吕永和译	(136)
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 ——面向 21 世纪日本政党政治体制的重构	李寒梅(151)
大正时期日本私有铁路的发展及其特点	祝曙光(173)
当代日本农业的兼营形态及其发生 ——关于长野县乔木村的调查报告	李 文(187)
日本工人生活的现状和今后工人运动应采取的方针 [日]服部义美	(202)
学习《古事记》	[日]梅原猛著 卞立强译(209)
兰学事始(上卷)	[日]杉田玄白著 潘金生译(223)

日本现代高等教育的目的与功能初探·····	张光珮(249)
日本的“预卜文化”·····	程绍海(261)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论兼及健康饮食法	
——1994年11月15日在日本京都的讲演	
·····	贾蕙荃著 王春生译(275)

文学传播中的母型与变型·····	[日]中西进著 张哲俊译(290)
试论野间宏早期文学创作的特点·····	于荣胜(300)
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的思想与艺术·····	王顺洪(313)

蒋百里与戴季陶日本观的比较·····	唐利国(322)
印度人和土耳其人的日本观·····	安文(335)

我国日本史研究近况(1990—1996)	
·····	林芳 李淑红 毕可中(344)
美国的日本学:现状与前景·····	
·····	[美]海伦·哈德克尔著 陈文寿译(377)

《东方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中有关日本的一些问题	
·····	李威周(395)
填补空缺的力作——评《战后日本外交史》·····	王新生(409)
相浦杲先生及其中国文学研究·····	胡双宝(416)
日语研究的新角度——评《日语的语气和人称》·····	穆公(420)

筹建“世界日本学会”的倡议·····	[日]别府春海(424)
--------------------	--------------

编后·····	(427)
---------	-------

耄耋犹笔耕 东瀛载誉归

祝贺周一良先生荣获“山片蟠桃奖”

“山片蟠桃奖”是与“福冈亚洲文化奖”齐名的日本设置的国际大奖。前者奖励对日本文学、艺术、思想有重大贡献的日本以外国家的学者，后者奖励对亚洲学术研究有重大贡献的日本国内外学者。“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于1990年，每年评选一次，一次5名，大奖1名，学术研究奖与艺术文化奖各2名，至今已7次，我国有巴金（第1次）、费孝通（第4次）、王仲殊（第7次）等三位作家、学者先后荣获大奖。“山片蟠桃奖”比“福冈亚洲文化奖”设立更早（1982年），亦每年评选一次，但一次仅1名，至今授奖15名，前14名除一位韩国学者外，皆为欧美国家学者，因此，周一良先生是亚洲第二位，中国第一位荣获此奖者。正如周先生所说，“这不仅是我自己的光荣，而且也是全体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光荣。”

授奖仪式于（1997）年2月1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周一良先生出席并发表讲演，日本主要报纸作了报道。《产经新闻》指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获奖。第11次获奖者美国的詹森氏在哈佛时代还是周氏的学生。”（2月20日15版）授奖式上宣读的“赠呈（授奖）理由”全文如下：

周一良博士多年来从事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涉及自奈良时代至明治维新许多日本历史问题。魏晋南北朝等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优良业绩自不待言，在中日文化关系史方面也作出了值得瞩目的研究成果。例如，1990年6月出版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自同年始又翻译新井白石

自传《折焚柴记》，并从新的角度研究新井白石。

“周一良博士 1939 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1944 年以毕业论文《中国的密教》获得博士学位。1946 年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秋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指导提携后进，促进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建立。周一良博士是中国的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的先驱领导和重镇，现在也作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致力于推进日本研究。

正如周一良博士的自传《毕竟是书生》（东海大学出版会，1995 年）所详述的那样，作为一个真挚的学人克服了诸多苦难而作出许多业绩，这是最为可贵的。1935 年燕京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即是《大日本史的史学》，自那时以来 60 余年始终致力于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对此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为此授予第 15 次山片蟠桃奖。

“山片蟠桃奖”是大阪府设立的国际奖。大阪是江户时代日本商业中心。山片蟠桃出生于大阪，活跃于商界，并成为当时有名的町人学者，著有《梦之代》12 卷，其思想中带有近代的合理性。以他命名意在表明日本文化与世界相通。

松村谦三与中日关系

刘德有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官民并举等几个不同阶段。在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转为半官半民的过程中,日本方面有一位政界人士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日本人士就是松村谦三先生。

五十年代末,中日两国关系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松村谦三先生就不顾年迈和个人安危,克服了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毅然投身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事业,为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可贵贡献。从那时起直到1971年以八十八岁高龄与世长辞为止,松村先生曾五次访问中国。松村先生每次访华,周恩来总理都与他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当时,年纪尚轻的我,有幸担任了前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和一些重要活动的翻译工作。

松村谦三先生战后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是1959年10月。这一年的春天,我曾下放在山西省洪洞县农村劳动。9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原单位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回京。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赶回北京。返京后,才知道是为了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外宾接待工作和准备迎接松村先生一行访华。

松村先生选择那个时间访华，看来不是偶然的，而和当时的中日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通过两国人民的努力，1952年6月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逐步地开展起来，呈现出发展的势头。但是，1958年5月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①，彻底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不消说，这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两国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剩下的只有中国方面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照顾物资”这一细小的渠道。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国内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考虑中日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那是1959年9月的事情。紧接着，当年10月，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来华。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成为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某种契机。

松村谦三先生，我并非初次与他见面。1955年12月我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时，在邀请单位——日本学术会议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曾经见过。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松村谦三先生主动出面会见郭沫若，以及后来他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而四处奔走，实属不易。我认为除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外，还跟他的出身、经历和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松村谦三先生明治十六年(1883)出生在日本富山县西砺波郡福光町。祖父和父亲都是具有汉学素养的人，他从小就受了汉学的熏陶。他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在《报知新闻》社当了七年新闻记者，于大正八年(1919)当选为富山县议会议员。昭和三年(1928)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松村先生出生的那一年，正处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进行社会变革即

推行“文明开化”的高潮。在对外方面，政府准备跟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进行谈判，以修订德川幕府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在日本国内，政党也开始了活动。当时，日本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贫困，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松村谦三忧虑日本农业的前景，他在大学毕业时写了题为《日本农业恐慌论》的论文，指出：“要拯救现在的（日本）农村，无论如何也要改变和改善社会的制度。”

松村谦三战前任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时曾多次到过中国。他在任记者时，在中国东北见过张作霖。1922年，他随民政党国会议员永井柳太郎到青岛和华北一些地方旅行过。1928年他当选众议员后的第100天，随从以民政党国会议员山道襄一为团长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所谓的“济南事变”（即“五三惨案”）。张作霖被日军阴谋炸死时，他恰好也在现场。曾经给松村谦三做过秘书的田川诚一在《松村谦三与中国》一书中写道：松村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是“受世界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旧中国’，而且松村先生也是以‘大日本帝国’的一个成员，从统治者的立场去观察中国，而毫无疑问，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受到革命的洗礼，发生了像今天这样的巨大变化”。

战后，日本也发生了变化。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松村谦三做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东久迩内阁的厚生大臣，10月出任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在他主持下进行了第一次“农地改革”，为日本确保粮食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及后来的经济高度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松村先生在保守党内倡导反对官僚政治，反对不顾民族利益顽固执行亲美一边倒政策的吉田茂内阁。后来在岸信介内阁背离日本人民的意愿，推行敌视中国人民、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反对岸信介的倒行逆施，积极主张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松村先生一向崇敬郭老。1955年3月19日，第二次鸠山一郎内阁成立时，松村先生出任文部大臣。当时，他曾托人捎

信给郭老，表示欢迎他访日。就在郭老抵日前的1955年11月21日，第二次鸠山内阁实行了总辞职，所以郭老当年12月访日时，松村未能以现职的文部大臣身份来迎接郭老，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不管怎样，松村谦三在日本迎来了郭沫若，他感到非常高兴。松村在宴会上发表即席讲话说，（中日之间）过去的事不应当让它重演。“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要保证实现这句话。”他还说，“不管学者也好，政治家也好，我们应当不分国别，不分政治制度，大家携起手来，实行和平共处，共同为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努力。”

二

从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来看，松村谦三先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第一次访华，是极为重要的一次行动。这次访华从10月19日到12月2日，历时近一个半月。

当时，由于岸信介内阁对中国采取“静观”态度，松村谦三的访华虽然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只能采取一般友好访问的形式，但是中国方面对松村先生的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视的。在代表团到达的第三天晚上，周总理便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办了欢迎酒会。周总理站在大厅门口，亲自迎接松村先生及其一行，并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中国方面的重视程度，我们还可以从出席这次酒会的人士中包括了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卫生界、新闻界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得到证明。

松村先生的首次访华，无论从中方或日方来说，都是表明自己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的一次重要机会，并借以探索打开中日关系僵局、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中日双方的这一基本想法，在欢迎酒会上通过周总理和松村先生的即席致词表达了出来。周总理说，“松村先生同石桥先生一样，都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远东和世界和平，

共同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努力。我们希望松村先生这次到中国来能多留一些时间，多同中国各方面的朋友谈一谈，多到各个方面各个地方去看一看，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从而更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松村先生说，几年来，他一直希望访问中国，并同周总理进行直接的交谈，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说，“日中两国之间过去不幸发生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们深为遗憾。过去的战争使贵国遭到很大损失。今天，我可以说，日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日本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中随着亚洲的繁荣而生存下去，日本人民愿意走和平的道路，我愿意代表日本人民表达这种愿望。”松村还表示，他这次访华抱有多种目的。他首先希望能同中国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其次是要看一看新中国的巨大建设，同时要看一看中国的古代文物。他还说，作为一个老汉学家，他希望游览名山大川，作为一个多年做过农业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人，他希望了解中国的农业和文化教育工作。一句话，通过这次访问，希望能够达到双方真正的理解和亲善。

在松村谦三第一次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进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有的采取了会见全团的形式，有的则是“一对一”的单独会谈。每次会谈，时间都很长，有时竟谈到深夜。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车上进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单独会谈。那是1959年10月25日上午，周总理陪同松村先生一行乘坐专列到距离北京200公里外的密云水库建设工地参观。这趟专列挂有一截公务车，内部布置得像客厅一样，可以会客。列车启动后不久，我陪同松村先生来到这截车箱。周总理已经等候在那里。中国方面陪见的只有廖承志先生。而日本方面，没有陪见人。周总理利用列车往复运行四个小时的时间，同松村先生进行了深入会谈。日本人后来把这次会谈称为“车中会谈”。

四次会谈的中心问题，不消说是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总的来

说,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各不相让,双方都把该说的话说了。整个会谈,我认为周恩来总理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双方在会谈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周总理对松村先生不顾高龄为改善中日关系率团来华给予肯定,并对他战后出任农林大臣时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表示赞赏。

(二)关于中日两国关系。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两国的关系,而且要逐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实现互不侵犯。我们认为,在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之后,可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把互不侵犯的范围扩大到远东、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周总理强烈谴责了当时岸信介内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日本有一小撮人,包括执政的一些人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而且阻挠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松村谦三赞同周总理对中日关系的总的看法,并认为“完全是正确的”。他说,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的友好传统,两国人民不应当处于现在这样的不幸状态。我们应当使这种友谊恢复正常。他说,现在世界吹着和平的风,我们愿同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做最大的努力。但松村却为岸信介极为辩护,说他没有敌视中国。而另一方面,松村又说,周总理指出的情况是一定会改变的。

(三)关于日美安全条约。周总理严正指出,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将使美国继续在日本保留侵略亚洲各国的基地,因此,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不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周总理说,战后,日本处于半占领状态,建立了外国军事基地,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是不幸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现在,日本人民要求摆脱这样一种束缚,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并要求废除这一条约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国人民同情并支持日

本人民的这一斗争。因为中国人民担心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进而复活军国主义。松村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把“不平等条约改为平等条约”,并不像中国所想的那么严重。

(四)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指出日本确有一小撮人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反对搞“台湾独立”。松村则回避问题的实质,说台湾是日本战败而放弃的。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应由获得的一方自己去解决,而不要向日方提出。

(五)关于所为“政经分离”的问题。周总理针对日方提出的这一论点指出,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有可能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使一度中断的中日贸易关系得到恢复,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促进这一关系的发展。这就是政治。有人把政治与经济分割开来,这是奇谈怪论。我们邀请松村先生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政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关系。

(六)松村谦三向周总理推荐了曾任鸠山内阁经济企画厅长官的高碕达之助^②。松村说,今后他本人侧重政治,而高碕则侧重经济,共同为推动日中关系而努力。在松村访华的翌年7月19日,岸信介内阁倒台,池田内阁成立。新内阁的政策趋向,使人们看到日中关系松动的一线希望。在这种形势下,高碕于同年10月率领日本实业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松村谦三第一次访华结束时,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既未发表公报也未发表纪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没有取得成果,而是双方有意识这样安排的。有人曾经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松村先生的这次访华,总的来说,为后来双方签署廖、高(碕)贸易协议和互换记者协议,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过渡奠定了基础。

三

松村谦三先生率团第二次访华,是在1962年9月。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治问题。日方的底牌是,谋求日中贸易进一步发展,但经济要同政治分开,即坚持所谓的“政经分离”的方针,以回避接触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

中国方面对松村的第二次访华,同第一次一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代表团一行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9月15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总理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松村谦三先生踏上中国国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中秋佳节,因此愿以中国的一句话“花好、月圆、人寿”,欢迎松村谦三先生及其一行。月圆象征着团圆,亚洲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并且应该团结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家庭里。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而且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他赞扬松村谦三先生不仅愿意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努力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下基础。周总理意味深长地强调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看得远一些,对于松村谦三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

松村谦三说,我们这一次到中国的第一天,适逢中国的中秋节日,我们很高兴能赶上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刚才周恩来总理讲了“花好、月圆、人寿”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也希望日中两国的关系永远能够像中秋明月那样圆满和明亮。松村强调说,我这次来中国访问,就是要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交换意见,以便为改变目前日中两国的这种局面和促进两国的亲善关系奠定基础。他说,我们在东方的两个兄弟国家应该建立起真正的兄弟关系。

在松村这次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进行了三次会谈。

9月16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历时3个小时。周总理在